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9~18

2019 年 12 月 16 日

关家庄琐记

李子壯¹

延川县有个清平川，清平川中部有个关家庄。1969 年 1 月我们 21 位知识青年在这里插队。到目前为止，21 人中出了两个名人：一位是孙立哲，是当时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，现在美国，在那里闻不闻名尚不知道；一位是史铁生，现为作家，现在每天“坐”在家中——因为他已经由于高位截瘫而永远站不起来了。但此篇绝不想为这二位“英雄”写传，因为伟大无非是对历史的省略，而我想写的，却恰恰是省略的那一部分，故称“琐记”。

¹ 本文写于 1991 年，印《参阅文稿》时再做修改。

“民以食为天”

插队第一年，我刚年满 15 岁。关家庄 1968 年日工值不过一毛二分，口粮不足三百斤，吃麸咽糠尚不足果腹。一下来了 21 个不知会不会干活，但肯定会吃饭的学生，谁会欢迎？可怜这批学生娃，满口反修防修，不知道吃饭才是第一位的。

但我们很快就懂得了“食为天”这个真理了。当懂得这个真理以后，第一个牺牲品就是我们养的那口猪。那是一只花 15 块钱买的克郎子，养了不到三个月我们的肚子就认为它已经肥了，一刀下去，只杀了 34 斤肉。第二口猪勉强熬过了四个月，又被我们杀了，杀了 56 斤肉。这些肉在我们十个大小伙子和闻香而来的知青们的努力下，每次只吃了两天就光了。我们又开始了那种“钱钱”饭加窝头的生活。

更使我们头痛的事情是推磨。陕北过去有句贬人的话，叫“看你闲得像个驴似的”，但那几年，队里最闲不住的就是驴。由于队里的驴太少，我们就很潇洒的当“驴”了。每月男生全体出动推四天磨，把原粮变成面粉。但一逢下雨，粮食便“捂”了，于是得啃一个月带霉味的窝头。我们推磨是有收音机伴奏的，在当时成为关家庄的一大奇观。第二年，我们终于发现在推磨问题上人与驴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，于是队里花 13 块钱买了一头老驴供我们专用。从此，我们找到了一条最经济的路，即花十几块钱买头老驴，使用一年，死了再买。

凭心而论，在吃饭问题上，的确该给我们村的女生立一块碑。虽然她们和我们一样患有不愿做饭，只愿革命的“时代病”，并且第一年因此而和男生分灶了，但当第二年合灶后我们便发现，她们吃的甚少，干得颇多，体态也违反投入产出法则而日趋丰盈。从一个长过程看，柔能克刚的确是人间至理，在陕北，没有女生，男生吃饱肚子是不可想象的。

我第一次回北京时，到家包子已熟，但尚未开饭。我在一家五口人的注视下，把全家中饭（也许还有一点晚饭）的包子吃得只剩了一个，然后才告诉家人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而家里只得再去做饭。当时一位高中生曾感叹道：“过去看《水浒》，对武松的饭量颇有疑问，现在我信了。”因为他如果甩开腮帮子，是不会比武松逊色的。

“公家儿的”

“公家儿的”是延安老百姓对知识青年的一种称呼，其含义大约是你们是公家的儿子，和我们不一样，迟早要走的，是有人管的等等。这和民间的许多概括一样，大都是只可意会，不可深究的。

在陕北插队知识青年有一个特殊性，即是老三届中最后一批也是最苦的一批插队生，余者大都留京就业了。这就形成了插队知青的思想动荡，这种动荡首先表现为知青的自相“残杀”。当时只要逢集，在集上就可以看到一帮一伙手提棍棒的知青，在那里晃来晃去。不抢老百姓，专劫知青，走过来就是“哥们儿危了，拆达拆达”。倒也不多抢，块儿八毛就行。厉害的也有，一伙人闯入其他知青点提了母鸡就走，说是借去下两个蛋。这些人谈不上无恶不作，但实在是混得出奇。但到了第二年（1970年），形势大变，变成天下知青是一家了。萍水相逢，便解囊相助，一人有难，大家支援。车站买票，前面只要有一个知青，所有知青都等于有票了。自相残杀到底不如抱团取暖好。这种关系有人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我们村的知识青年由于书读得太多，不会打架，故老百姓口碑不错，但总感到我们比他们“性残”。我在山上看见一只蚱蜢，立刻用锄头就把它打死了，老乡就说我：“这也是生灵，你打它做甚？”我说：“这

是害虫，除恶务净你不知道吗？”这位老乡的回答竟是：“天底下的万物就是靠老百姓养着咧！”

知青在老乡眼中变成了研究对象之后，就发生了许多问号。首先是衣服。插队知青多从家里拿了些大人的旧衣服去穿，以防“脱离群众”，体现艰苦朴素，不知老乡就是解不下（不懂）：“咋这破？城里是不是有做破衣服的？”弄得我们哭笑不得。

还有一件使老乡不明白的就是学习。老乡们常议论说：“这把子公家儿的成天老看老写不知有甚用，也不怕费灯油。”当时知识青年中许多人学习刻苦，纵览中外名著者有之，苦读高等数学者有之，怀揣《唐诗一百首》边赶驴边背者有之，洋洋洒洒直抒胸臆者有之，还有带着油印机下乡出刊物小报的呢。

陕西有句话，叫做“饱吹饿唱”。当时唱《外国民歌二百首》及《续集》成了一种风气，东西方文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在陕北交汇，以至于连本村的瘸子都唱起“红莓花儿开”，并带有一点信天游的味道。知青中还有自己作曲的，但多数还是原曲改词，如把电影《红旗渠》插曲重新填词：过一天，如同过一年，望不尽的黄土山，72 条羊肠小路，我一步步往上攀；昨夜晚，我梦见，妈妈来到我身边，仔细地看孩子的脸，泪水就挂在胸前……

当然，苍凉之歌并非无奋发之气，陕西老百姓对知青在受苦方面的表现还是满意的。陕北人称劳动为“受苦”，农民自称为“受苦人”，干重活了叫做“苦重”。知青大都有股锐气，但远不如老百姓的韧劲大，所以，豁出来的就显得比老百姓能吃苦。譬如挑粪上山，老百姓是挑两挑，歇一歇，要走都走，要歇都歇，我最烦此事，所以总愿和队长说好，这一下午到底挑多少担，中午不睡挑完我就回窑了。老百姓的理论是“山高怕的慢汉摇”，知青的理论是干完拉倒。但只要能受苦，便在老百姓

眼里是好样的，就能得到认同。

陕北老百姓和知青处久了，就开始发挥知青的“优长”了。老百姓发现知青最大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，既不怕得罪干部，又不怕得罪“强人”。于是凡遇到要得罪人的事，就让知青去干，比如“吆猪”、“照枣”等等。这类活轻，只要把从家里跑出来的猪吆回去就行，但要罚粮一升，或罚工分。我干过一阵这类工作，大约属于城市里戴袖标的“城管”或“吐痰罚款”类吧。每当我拿着棍子出现时，村里就响起一片唤猪声。由于庄稼是队里的，而猪是自己的，大凡心眼较多的婆姨们，总要把猪放出去吃点“公食”，就像城里人拿公家点信封信纸似的。陕北婆姨唤猪声极长并有曲折，结尾时一律高音。我初逢此景，觉得颇像电影中鬼子进村时的情景，不免有些沮丧，但久而久之，倒进入了什么“绕梁三日而不绝”的佳境了。罚没过程一般是简单的，偶尔有些冲突，但不严重。扣工分是可以接受的处罚，要拿粮食就困难一点了。有一回一位婆姨横在门前死活要保卫那一升玉米，大有拼死一决的劲头，但身手矫健的知青翻窗而入，取粮后扬长而去。该婆姨坐地大嚎不已，据云：丈夫收工回家后她又挨了一顿暴打。

得罪人在农村是一件颇为严重的事，当时有诗为证：“得罪书记政治犯，得罪队长茅粪担，得罪会计秋后算，得罪保管斗量偏”。不过凭心而论，当时的干部是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的，唯一可占便宜的就是去开会时也可以记几个工分并吃顿带肉的烩菜。我们大队书记叫樊富贵，背极驼，且家极穷，1948年入党，上台下台几次，前后当了十几年的书记。有一次他向我解释了他当书记的原因：“咱农村常搞运动，我在台上时整了些人，他们恨我。我要是下了台，他们就要整我的，所以，我一定要在台上。”这不知是不是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另一种粗俗的体现，但至少可见得罪人的可怕。知青不怕得罪人，一是由于自己不谙世

事，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外来户，与村中无瓜葛、易公平且各方可接受而已。

当插队到第三第四年时，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就多了。不是知青农业技术水平高，主要“抗硬”，一不怕公社干部，什么违反当时政策的事都敢干，比如“包工”，“瞒产多分”，“开互地”等等，对老百姓有好处；二不怕农村中的“强人”，令出必行。试举一例，农村开会是一大难，有位知青初当队长，钟响后半个小时，仅到六人，立即宣布到会者每人记四分工，便宣布散会。第二天钟响人到，连婆姨娃娃都来了，这才开会，工分却是没有的了。

黄土高原以它特有的胸怀默默地接受了二万六千名北京知青，重铸了他们的筋骨和灵魂，他们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，但他们仍旧是“公家儿的”。他们增长着对中国老百姓的热爱和了解，但永远不会变成农民，即使是头戴白羊肚，脚穿老山鞋，嘴说陕北话，但他们还是“公家儿的”。陕北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希望他们变得和自己一样，而只是希望他们能为陕北老百姓做些事，或者说在当官后，少做些损害老百姓的事而已。

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

陕北知青点有一个特殊性，即每个知青点都有一个带队干部，是周总理让北京市派来的，共约一千二百余名。他们是1970年来的，当时是“知识中年”，到全部离开时，大约已有人可算“知识老年”了。

到陕北的北京干部和知识青年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“有问题”的比较多。陕北插队知青，大都家中有些毛病，不是黑帮，就是“反动权威”，而插队干部也多如此，不是本人受过什么冲击，便是家里什么人有问题，

总之，大都在单位不甚得意。

关家庄的带队干部名叫郝建，原是八·一学校的护士长，解放战争入伍，行政 17 级，当年 40 余岁。到庄之后，即积极开展工作，但不久就发现无法工作。因为这批知青虽说是自己酷爱学习，却都不在规定内容之内。所做之事犯忌之处颇多，而又毫不在乎，就拿听收音机来说吧，世界各台都听，屡戒不止。至于生活上更是脏得一塌糊涂，完全不符合卫生标准和持家原则。总之，规定要进行的工作都困难重重，久而久之，她便入乡随俗了。

其实，郝建本人很苦，丈夫是北京军区干部，因受批斗而精神失常，唯一的女儿又患有先天性脊柱裂。每到晚上，她在陕北窑洞中面对孤灯，只有自己的小收音机在响。各种滋味，已非语言能形容。只是我们当时涉世未深，迄今才知其中之苦。真不知当时让她到陕北的那位先生，是否还有点人性？

郝建在别村知青看来，是一位“好阿姨”。由于我们村知青都愿革命，不愿做饭，不知何时开始，推磨、筛面及一些有关生活事项就历史地落在她的头上了，而我们大都心安理得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才发现我们当时忘记了一点：她的牢骚又向谁说呢？现在的郝建同志，大约已垂垂老矣，但愿她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
北京干部在知青分配时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。面对要人单位的挑剔和本地干部对本县知青的偏袒，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，加之这批知青的父母又不争气，不是让“文化革命”给打倒了，就是属于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一类，所以北京干部不得不像售货员一样搞起了搭配出售，送出一个算一个。出身不好表现好，缺点不多特长多，那是天上少有，地上皆无。你是保密厂不要他，那我只能给你一个出身好的了，但他是派出所“常客”，三进三出，你要不要？你说此人父亲有问题没结论，她

母亲可是老干部，并且他父亲问题近日就要解决，那还不安排个部长？……总而言之，到了最后，北京干部和知青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因为他们回北京的时间取决于知识青年的分配速度。

知识青年在陕北老乡眼中，最适合干的行业有两个：一是教书，一是当饲养员。我恰恰这两行都干过。

知识青年当饲养员的主要优势在不偷料。“牛哭猪笑，饲养员偷料”是当地的俗语，而知青见着黑豆就反胃了，绝不偷料。喂牛对知青也很适合，主要是能看书。虽说日月颠倒，但读书效率很高。特别是夏天，把牛赶到沟里，你就可以在沟口一躺读起书来。

我插队的最后一年教了一年书，教的是复式班（即两个年级一个课堂），四年级 10 个，五年级 7 个，共 17 人，都在一眼窑洞中。空气、光线都有问题。问题最大的是上课，四年级上课时五年级便自习。但学生的耳朵可不是这样，讲算术好一点，讲语文则大家都听，那只得听之任之了。

尽管城市在大批“师道尊严”，但农村还是很尊重老师的。农民见我时说：“娃不听话你便打！宁给了好心，不给个好脸。”逢年过节，学生便给老师送吃的，那年端午节我便收了几十个粽子。不收，学生便要哭出来，认为你瞧不起他。其中，绝没有请你办事的意思。

教书中首先使我惊异的是农村孩子的聪明，浑金璞玉，雕琢即成。农村孩子学习仅有课堂那点时间，一放学便打猪草，带弟妹，晚上家中仅一盏油灯，是不属于娃儿的。要让我在这种条件下学到他们那种程度，自问不及。

但是这种聪慧全叫教材给扼杀了，语文算术全与他们的生活无关，三年级的语文就讲党的基本路线，从“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”到“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，五年级的应用题是“自从赫鲁晓

夫——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后，苏联农业生产下降了XX%，原产值为XX亿卢布，现为多少？”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让学生从根本不知道的事物去完成数学抽象，这像不像专拔好牙的牙大夫？

于是我在农村小学开展了一场“教育革命”，语文就是讲故事，认字，写笔记，算术题全部自己出，牛、猪、猫满黑板，工分粮钱一起上，学生可以反驳老师等等。有时，我从学生的反驳中颇受启发。比如，我讲课中说“现在电影比过去少多了”，小小地发泄了一下对现实的不满。不料，却遭到了学生的一致反对，我问：“你们的证明呢？”学生答曰：“过去两年看不上一场电影，现在一年可以看两三次。”我只得承认他们的“正确”，因为境遇的不同，对问题的感受是不会相同的，根本谈不上“标准答案”。

农村小学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小学幼儿园合一，小学生带弟妹上学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在一次上语文课时，我正讲得兴起，忽然发现课桌下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王平三岁的弟弟世平爬到我的脚下了。为了不破坏课堂气氛，我顺手拿起桌上的手表塞到他的手中，他便转身向他的哥哥爬去。王平一见，竟然大哭了。我不由得大怒，斥责王平：“你叫他玩么，下课再说！”王平哭答：“他要是弄坏了，我家赔不起！”一个道理，不是任何侠义之举，都能被穷人接受的。

我迄今弄不明白，我这一年的教书生涯是不是就属于这类侠义之举。我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黄土高原之外的事情，我也使他们开始迈进了新的知识的殿堂，我使关家庄小学五年级全体学生（尽管才七个）升到了初中，创造了关家庄教育史上的第一个100%的升学率，但是，我好像也给他们带来更深的痛苦。

因为我是个跳班生，所以我喜欢搞点“英才”教育。由于同庄一位女知青的推荐，我便把一个名叫三人的孩子作为“英才教育”的对象。

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复员军人，从陕北打到广州，成为广空的地勤人员。后复员回乡，当过村大队长。颇有能力。1971年因为一过失被同袍发现而名声扫地，终日郁郁。“我过去扔的比现在吃的好得多”便成为他的经常性话题。但大凡倒霉人家中的孩子多聪慧，三人便属这类。我让她跳了一级，功课仍非常好，据说一直得上到高中，后考大学，未果。1987年她来北京看我，其痛苦颇深，口口声声对不起我。仔细一问，其心颇像我们插队时用于自嘲的两句话，“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”。上学吧，不行；就业吧？无业；受苦吧，不愿。假如不碰到我这么个老师，也许早就去做农村的帮夫育子的全套功课了，而绝不会像现在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的痛苦。我后来觉得理论上也许是我对不起她，因为我的启蒙成为她痛苦的根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种启人灵智而使人到处碰壁的教育，是有其残酷性的。²

“没有是个爱，有了是个害。”这句谚语说明陕北老百姓是颇懂辩证法的。知青对于陕西老百姓来说，是爱恨各半。

最受陕北老百姓直接拥护的，是知青使周总理知道了陕北的真实情况。周总理为此流了泪，发了火。周总理说来延安老区的慰问团、汇报团从没向他说过实话，说陕北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毛主席在的时候，委托北京市支援延安。老百姓对此是非常感激的。

但好事并不好办，如孙立哲在我村行医，“泽被天下”，各县农民纷纷到我村投医问药，连县城附近的也不例外，我问一位舍近求远到此看病的老乡，为什么放着县医院不去而跑到这个山沟里来，这位老乡答：“这里的医生爱穷人。”但孙立哲名声大振的后果却使关家庄的老百姓叫苦不迭。当时每户每年接待的病人在五六十人以上。一个穷队，吃糠

² 三人现在新疆伊宁，夫妇两人包过几百亩地，还当过旅店老板，儿子考上北京科技大学，一直读完博士，并和另一女博士结婚。

咽菜尚不足果腹，下工回家炕上坐着三四个要饭吃、要柴烧、要水喝的病人及“陪护”，你说怎么办？可惜当时不懂得市场经济和生财之道，否则关家庄必定是全县首富。惜哉！

没有知青的村子想知青，因为有了知青就有了不要钱的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；有了知青的地方又怕知青，因为他们似乎并不属于这块土地，不知会在哪里捅出一点不合时宜的乱子来，他们在农村的确是特殊的一群。举个精神病的例子吧。我们请了一个老百姓的婆姨给我们做饭，她的丈夫是个“疤子（即麻子）”，故人称“疤子婆姨”，其实她脸上一个“疤子”也没有。1971年夏，她忽然有几天不来了，听女生说她得了一种怪病，知青去了便好，知青不在就犯，见人便打，三五个人按不住。因我在喂牛，故晚上才去她家探病。未到门口，就在路上发现了点点香火，走到门前，发现炕上正打成一团，而她丈夫正在屋里放炮仗驱“毛鬼神”呢。我不由地怒从心头起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们做甚呢！”她丈夫愣了，她却好了，笑嘻嘻地叫我“上炕”。问及刚才的事情她一概不知。一位老婆指着手印犹在的脸问她为何打人时，她一脸真诚：“你是我奶呢，我咋会打你呢！”她丈夫说他被闹了几天实在支持不住了，求我陪她聊天。我答应了，在炕上有一搭无一搭的盘腿听她倒苦水，从大伯子逼嫁到后来种种，一直到四点多钟，她才沉沉睡去。这是她几天来第一个“囫囵觉”。我跑20余里去楼河找石大夫（石大夫是北京干部，原在海淀医院精神科工作）。当石大夫来了以后，我才知道是受刺激所致。但她为什么在发作时一见知青就好呢？石大夫也未说出所以然。大约是因为知青都有“气功”。是锐气、傲气，还是孟夫子的“浩然正气”？大约都有点。反正我知道这是不能用“恶人鬼也怕”来解释的。

岁月的反思

在陕北插过队的人，往往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，对于自己曾经以多种方式贡献过青春的地方，说坏，不忍；说好，不愿；因此，凡对大事物的评价，还宜用老子的一句话——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

以我个人的亲身体会而论，在陕北插队的这批知识青年，主要是实践了“很有必要”的那个指示。毛泽东同志曾经对知识青年问题做过三次公开的指示，20世纪50年代是“大有作为”，到了1968年就变成了“很有必要”。到了1973年，居然成了“寄上三百元，聊补无米之炊”了。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最高指示，反映了他老人家三种不同的心境，应该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“运动”最好的“描述”，再加一句，都是多余的。

(一)

陕北这个地方，是个老区。老区大都具备两个特点：一是很难找到“阶级敌人”。1936年就进行过土改，到1969年的时候，够上划富农线的都是凤毛麟角。这就使在城里随便“横扫”一下，就可以找出一批“阶级敌人”的红卫兵颇为失望。另一个特点是贫穷，干一天也就是一两毛钱。因此，对于知识青年讲，还是“吃饭的问题最大。”插队第一年，我们就发现越穷的地方的粮食，越难吃进肚子。陕北种的是五谷杂粮，细说起来不下20种，凡我们勉强会做的饭，都是数量极少而又好吃的，凡我们不会做的饭，却是大量的。比如豆面，那是要会配、会磨、会做才能好吃。直到我们离开陕北，大约也没有人学好做饭的全套本领。

好在这件极复杂的事情，被我们用现代智慧一举解决了——我们雇了一个老百姓给我们做饭。开始是一个男的，后来考虑不经济，就雇了一个婆姨，一天我们划给她五分（工分，下同）。这是一笔两利的劳务交换。我们自己留一个人做饭，男生少挣十分，女生少挣七分，不仅质量难以保证，而且还一律拒绝批评。这位婆姨也极高兴，因为她可以挣到两倍于其他婆姨的工分，同时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，成为一个完全的女人。但这种现代智慧当时受到了几乎一致的批评。老百姓有人说我们像“地主”雇工，邻村知识青年则认为这样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则。但我们无丝毫悔改之意，因为肚子告诉我们，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。

（二）

我插队的延川县，大都是川地。比如我所在的关庄公社，就叫清平川。实际上就是一堆土山夹着一条河，河岸到山脚就叫川地。在这里受苦（陕北讲“受苦”就是“劳动”）主要靠腰腿的力量。胳膊的力量还在其次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当个石匠，又另当别论。在这里干活体力消耗极大，但只要吃饱肚子，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就普遍水平而言，陕北老乡干不过知识青年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孩子太多，吃得太差，并且缺乏爆发力。

劳动真正“难活”的地方，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。地越种越薄，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，衣服补丁越来越多，而箱子却越来越空。一句话，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，简单再生产的维持都发生了困难。像我所在的关家庄，连推磨的驴都要抢，可见到了什么程度。

条件好一点的生产队，也有用毛驴驮粪上山的。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如骥，赶驴上山的时候，揣着一本《唐诗一百首》，一边赶驴，一边吟

诗，在我们分手时，他起码会背三四百首诗词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后来成了一个化学教授。也许他把化学元素表也编成清平乐之类的词牌了。

(三)

对于我们这批知识青年来说，邢燕子、董加耕与我们不同。因为时代不同了，插队的方式也不同了。他们是属于“大有作为”的那一批，我们则属于“很有必要”的这一批。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所积累的就业困难而上山下乡的。这批知识青年，成了第一个承担文化大革命后果社会群体。刚到陕北时，我和许多同级的同学也就十四五岁，如果是在1936年，我们是红小鬼，如果在1986年，我们是童工（农），可在当时，我们不明不白的成了“黑十类”。即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臭知识分子、知识青年。

但是，这批知识青年中还是有不少人在陕北做出了令人惊诧的业绩。但凡做出成绩的，好像都不是“邢（燕子）侯（隽）”模式。比如我们村的孙立哲，在老百姓中那简直是华佗再世，扁鹊重生。但的确是无照行医，为现代法律所不容。今天回顾，仍称得上是丰功伟业。到关家庄看病的人多到把我们村吃穷的地步，堪称“空前绝后”。为何？一位老百姓讲到了本质：这个医生爱穷人。也有生产队长当得好的，那也是搞多分自留地、小包工、瞒产私分、掏互地等违反政策的事情，只不过公社不愿和知识青年发生冲突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“过了”。

下乡第一年（1969年）很乱，集市上一伙一伙的知青打架抢劫，有的还兼职做小偷，北京的土话叫“戳份”。抢劫的主要对象也是知青，但对女生好像比较宽容，但换了一种方式——“拍婆子”，搞得在回北京的一路上提心吊胆。1970年以后逐渐好起来，除了政府抓了一些人

外，主要因为知青抢知青解决不了吃饭问题。这种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聚众行为本身是不能存在于农村环境的。后来风气为之一变，知青之间变成相濡以沫了——一直到现在。

从文化革命到插队，不少人悟出了一条道理，从兽进化到人，其过程漫长到几百几千万年，但把人变成兽，却很容易。只要煽点情，点把火，再打碎饭碗，那就可以了。当普遍的被剥夺的意识成为社会心理，人们感到命运不可捉摸而又有失公平时，流氓就会成为社会的领袖，破坏将成为行为的准则，社会的偏见与漠视收获的是知青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破坏。

(四)

陕北这个地方，知识青年在农业上是很难大有作为的。因为当时的农村生产水平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。即使搞一些类似“9.20”之类的科学技术的应用，产量虽然可以提高，但谷贱伤农，是无法积累出改造农业的资金的。传说有位延长县出去的省委书记，看到家乡依旧，曾说过：“谁把我们村搞上去，我给他个县委书记干！”但重赏之下“无勇夫”，面貌依旧。所以知识青年往往在知识水准较高的非农领域做起事来。成为农村中的非农成分，如赤脚医生、民办教师、各种机手（拖拉机、柴油机等）。总之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待发展的岗位上，知识青年干得还是不错的。

农村中还有另一种岗位知识青年比较活跃。说好听一点是公益性岗位，说不好听一点，是得罪人的岗位，这不是由于能力，而是处于“第三者”的位置。陕北当时有几句民谚，叫做：“得罪书记政治犯，得罪队长茅粪担，得罪会计秋后算，得罪保管斗量偏。”当地的干部有时身

在关系网中，处理问题也困难，所以知识青年就充当裁判的角色。什么邻里纠纷，什么撵猪罚款，什么惩治小偷，多由知青出头，反正这批人一不懂人情世故，二不知历史恩怨，三不清楚得罪人后的远期效应，四也可以满足一下使命感。这也是陕北农民的一种用人之道吧！

但知识青年决不可能成为农民的领袖，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。真正能使山河变色的人物只可能来自农民本身。如陈永贵、禹作敏之类。而在陕北实际上只有跳出农业这个圈子才能使农村真正富裕起来。但很可惜，当时还不懂这个道理，懂了也很难做到。但是使知青个人富起来的办法实际上倒是非常多，但这又不能使知青兴奋，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成为先富的人，不仅为自己所不屑，也往往是要被千夫所指的。

(五)

陕北知青的文化现象很有意思。其中之一是肚子越饿越对“屠龙之术”感兴趣。文化越到消化不了的地方，它还愈加神气起来。当时有不少人以“身无分文，心忧天下”以自耀，点灯熬油看什么黑格尔，康德，莎士比亚，莫里哀之名著；还有些油印传抄各类“首长讲话”的，时不时地探讨一下“重大的”理论问题，例如，共产主义能不能在一国实现等等。这似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革的遗留，越是个人生计难以解决的地方，个人越喜欢把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，尤其是在理想与现实有极大冲突的时候。因此，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对社会运行的希冀不是“战争”，就是“革命”，——一种能使自己脱离当前状况的社会冲突。

另一种文化现象，就是拼命地学数理化，进度极为神速，半个月学完一本《平面三角》是一种极为平常的速度。（忘的速度也不慢）1977届、1978届大学生中的学习狂热，只不过是知识青年学习状态的一种

继续。

陕北知青当时和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广播。报纸全部都是“晚报”。一来就是一个星期的，并且是一星期以前的。因此，听广播成为一种习惯。陕北收听广播的效果很好，很多台都可以收得很清楚。包括“美国之音”。我们就曾经在“每日音乐会”的伴奏下抱着磨杆推过玉米。好像也没有受什么影响。也许当时太单纯了？好像也不是。大约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知青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“民国时期”吧！

这就是陕北的知青，一方面在为谋生而“受苦”；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挣扎在编织着那成“家”之梦；一方面感到了生活的重负；一方面又对学校赋予自己的理想，抱着不让其破灭的希望；一方面在诅咒命运的不公；一方面又在希望这只是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一种磨练。

(六)

那时，有些报纸上经常刊登知青的“典型经验”，这些经验大都一个主题，就是如何把知青变成农民，变成农民的就大有作为。那年有些知识青年提出了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”的口号，由于我们爱追求个“实事求是”，所以强烈地反对这种口号，提出了“扎根农村干革命，一生交给党安排”口号，重点当然在“安排”上了。我们还可以找到历史上的根据，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年就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，能有新中国吗？在当时虽然就被斥为“不能这样讲。”但大家心中都觉得很有道理。后来我们发现，最先喊扎根的，往往是走得最早的，剩下扎根的，倒是不喊的。

插队第一年冬季，延安县不知哪个村的知识青年，发出了一个过“革命化”春节的倡议，而且马上演变成一个不许知青回家的政策。生产队

极其负责，知识青年夜间行动后，还派人去追，只是岔路太多，无功而返。这种搞得天怨人怒的办法，至今想起来令人齿冷。陕北几乎每村都有几个逃兵，事隔 20 余年，抓知青就能手到擒来吗？要知道，对于知识青年，刻个公社的公章，那是比做吃豆面容易得多的事情。

其实，到了第二年，许多知识青年就不在冬天回家了，而改在夏天回家了，因为冬天的工分好挣，而夏收的确太苦了。这和觉悟一点关系没有，倒是可为“某某化”的春节做一注脚。

陕北曾经有两万余名北京知青，现在还在的，不知还有几个人了。但是，知青和陕北的那种复杂的感情，也许会存在得比较久远，虽不会传代，但也是至死不渝。陕北曾经是中国希望，也是个人才的受“洗”地，虽不说没到过陕北，就不认识中国，但起码是认识不完整。纵观中国历史，许多历史性的辉煌，往往起事于东南，收功于西北。陕北的发达之日，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之时。而陕北的发达，更多要靠走出去，而不是靠“扎根”，困死一隅。秦王不能扫六合，闯王也不会进北京。毛主席当年到陕北，第一个战略行动，是东征山西，西征甘宁青，在陕北厉兵秣马 13 个春秋，最后走出黄土地，赢来了全中国。回顾历史，面对现实，展望未来，会令人得到深深启示的——我们希望黄土地再度辉煌之日，正是祖国四化成功之时。